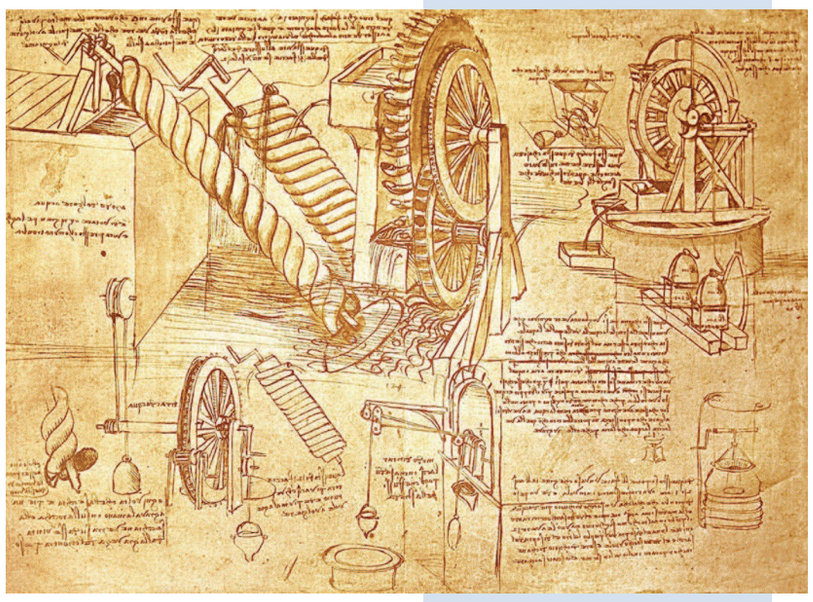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科大融合

何伟文

智慧的内涵变化后，知识的领域不再局限于神圣世界，而是扩展到了世俗世界。在新的文化氛围中诞生了“全才”，他们突破了原有的边界，将人类学问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尽管知识细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但是学科的划分却是古已有之。中世纪晚期由于各种壁垒的存在，学术的发展到了一个停滞的边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地理大发现等多重因素，人们原有的宇宙观受到巨大冲击，对“智慧”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求知的领域从神圣世界扩展到了世俗世界。新的宇宙观消融了各种隔离墙，在原本壁垒森严的不同学科之间出现了相互融合和渗透的局面。“全才”的大量涌现与此有着内在关系，他们突破学科边界，拓展知识的范围，以创新而不是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志趣，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大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全才”大量涌现。达·芬奇多方面的兴趣、才能和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图为他的水车设计手稿

“智慧”概念内涵的变化

自古希腊以来，“智慧”就被视为人所能拥有的最高程度的知识，是人类追求的一种崇高理想。柏拉图称智慧为对永恒不变的理念的沉思，亚里士多德把它定义为对事物第一动因的知识，奥古斯丁称之为对不可见的无穷宝库的沉思。到中世纪后期，神学使人类脱离自然，人被固定在原罪上，只能在孤独的修炼中放弃感觉和一切有形的东西，摆脱尘世和人生的一切关系；哲学则成为了一种关于古典秩序的神学，这种秩序本身永恒不变，十分完善，人在其中并无任何意义，只能接受一切事先的安排。这个时期最高形式的智慧是一种沉思性美德，最为人所崇尚的生活是一种宗教性的沉思生活，如阿奎那通常把智慧局限在关于精神存在的知识和对上帝的沉思的范围之内，而在《神曲》中只有贝雅特丽齐可以被恰如其分地与智慧联系在一起，是她引导诗人走向沉思上帝的终极快乐。

在欧洲社会从中世纪晚期迈向早期现代的过程中，人们对智慧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崇尚沉思生活开始转向投身行动生活。这时由于地理大发现、对人自身的发现等，人们认识到世界并不是遵循一种僵化的模式事先完全设计好的，而是可以通过人来改变的，一切都可以重新塑造。人关于宇宙的观念变得无限和开放，新的哲学从人的自由、意志和活力方面对人做出解释，提出人不能在对原罪的忏悔和自责中耗费一生，而应当去过一种拥有个人尊严的行动生活。15世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公开质疑沉思生活的优越性，想象另一种智慧的可能性：它是伦理的而非形而上的，是行动的而非沉思的。智慧被赋予了世俗含义，既可以属于修道院和大学，也可以属于市井社会；德行比关于真理的知识更重要，行动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智慧以具体的方式变得世俗化，带上了一种比以往更实用的色彩，人类事务开始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

多位人文主义者对智慧的认识渐进性地呈现出上述变化。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在作品中很少讨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或者系统性的神学，他崇尚的智慧从关于基督教原理的知识类型开始转向了伦理范畴。他的早期继承者萨卢塔提（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比他更明确地提出：“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行动生活在所有方面都比沉思生活更可取。”他认为人们在实践中最好把自己限制在人类事务的范围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基本责任，有智慧的人理应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萨卢塔提之后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重构了关于智慧的思想，明确表示厌恶那些对群体毫无贡献的沉思者。他还在书中引用西塞罗说过的一番话：就像马为了奔跑而生，牛为了犁地而生，狗为了气味的踪迹而生一样，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为了两件事而生，这就是知和行。

智慧内涵的变化使得人们对沉思生活的崇尚逐渐让位于世俗世界中的行动生活，这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学科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学科大融合局面的形成

伴随智慧内涵的世俗化及行动生活重要性的提升，知识的领域不再局限于神圣世界，而是扩展到了世俗世界。新的宇宙观推倒了所有的隔离墙，理性和信仰、艺术和科学、理论和实践等之间的壁垒被渐次移除。首先，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界限被消除，中世纪学者虽然貌似对各种古典思想兼收并蓄，但却坚定地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划出界限，相关学科的关系井然有序，各自的范围固定不变，彼此之间壁垒森严。1460年前后，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在佛罗伦萨发起了一场新柏拉图主义运动，它如燎原之火，势不可当，冲破了原有的种种藩篱。新柏拉图主义者尝试融合古典和中世纪这两种彼此不同的文化世界，不仅打破了哲学、宗教和魔术之间的隔离墙，而且消融了各自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界限。

其次，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科学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泾渭分明，而是两者相辅相成，在一个彼此交融的前沿共同发展。这个时代艺术的繁荣至少应当部分归功于科学，而对于科学的进步，艺术同样功不可没。譬如，画家阿尔伯特在关于形式的原则中综合了艺术和科学两方面的理论，希望把人物的心灵活动展现在肢体动作上，坚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艺术家必须全面掌握人体的各个细微之处，如果能画好这些部位，他就能给观者提供更多思考的空间。在阿尔伯特之后，达·芬奇集艺术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于一体，他让解剖服务于艺术，又让艺术服务于解剖，使解剖符合人体器官的形式及功能，因对象的年龄、性别和生理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解剖学的发展。

再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被冲破。在中世纪，两者之间缺少互动，工程师和手工艺人的创造发明难以进入“自然哲学家”的视野，反之亦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推演也不能得到实践的检验。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与重量成正比，12世纪时曾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但是直到16世纪才有人意识到，让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同时从塔楼上坠落，便可以对此进行检验。中世纪即便是在同一个学科领域内，理论和实践之间也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比如，中世纪的天文观测和计算都精确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关于天体运行的理论猜测也极具洞察力，可是没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打通了实践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沟通渠道。

学科之间因“隔离墙”的消除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融合和渗透的局面。这是一种各学科之间的完满融合，是一种创造性的和谐共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7世纪新的学科划分初露端倪时，方告结束。

“全才”的涌现和学术大发展

随着学科大融合局面的形成，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全才”（l’uomo universale）大量涌现。所谓“全才”，就是一个人表现出多种兴趣，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学习范围涵盖众多传统意义上不同领域的学问。许多艺术家在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每一个领域都创造出全新的完美作品，在其他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作为人本身同样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当中有的人除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之外，还对广泛的心智学术问题有精深研究。以达·芬奇为例，他既是画家，又是解剖学的奠基人，研究兴趣涉及人体骨骼、肌肉、组织等，而这些部位当时通常被专业外科医生所忽略。他在论述为什么有必要采用图像表现的新方法时，列出理想解剖者的必备条件，指出在令人恐怖的尸体面前，他应当胃口大开、意志坚定、无所畏惧，同时还应当有能力计算肌肉的运动，能够速写、画图以及熟练运用透视法。我们从中可见达·芬奇本人作为一名“全才”所具备的各种才能。

在心智学术方面，在意大利，同样涌现出真正出类拔萃的“全才”。但丁、马基雅维里便是典型例子。但丁是诗人、哲学家和神学家，在造型艺术上也是第一流的人才，他同时还是伟大的音乐爱好者。马基雅维里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为“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位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尽管布克哈特声称这类“全才”为意大利所独有，但是英国人菲利普·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等人的出现无疑使人有理由修正其论断。锡德尼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他写下的《为诗辩护》既是一种新教诗学，又是一份人文主义宣言，不仅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划时代的足迹，而且在政治、哲学乃至在宗教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不同学科各种思想观点荟萃的著作。

在学科大融合的文化氛围中，“全才”得以在心智上彼此激荡，相互启发。不同学科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形成团体，他们往往从其所擅长的专业领域之外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譬如，语文学家、古文物研究家威利巴尔德·波科海姆（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对数学有精深的研究，在他的启发之下，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开始研究阿基米德几何学，而丢勒的几何学论文又被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引用。再如，医学领域的天才奇洛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1553）是天文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和出众的诗人，他对人的大脑及其思维过程有着独到的研究，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关于诗人创作过程的思考，就特别得益于他对人的大脑的分析。

“全才”的出现为学术大发展提供了契机，最重要的标识就是有意识的创新活动。在学科大融合局面形成之前，中世纪的各种学问都被局限在特定的边界之内，在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它们似乎已经达到顶峰，取得新进步的可能性堪称渺茫。学科大融合及“全才”的出现使得改变这一局面成为可能，英国卓越的“全才”弗朗西斯·培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他指出世界不会因人的理解有限而缩小范围，人应当使自己的理解扩大和开放，直至拥抱整个世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不再像中了邪魔的人那样，被局限在小圆圈中不停地跳舞，我们的航程和赛道将和世界罗盘一样宽广”。培根声称人类所有的学问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他所关注的是把知识拓展到新的领域。在面对中世纪学术停滞的局面时，他不是谴责过去，不是查找前人的不足。他的哲学不是“修正”（renovation），而是“创新”（innovation）。在他看来，学术的进步不在于“灌输”某种已有的学说，也不在于“延续”传统，这两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都不是进步。培根把“灌输”和“延续”视为“培植”（cultivation），而不是一种“发现”（discovery），提出学术的进步需要新的出发点、新的学术兴趣、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方法。正是从这种全方位的创新中，诞生了现代科学，培根也被当之无愧地称为“现代科学之父”。

综上可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智慧”概念内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学科大融合的思想来源，在新的文化氛围中诞生了“全才”，他们突破了原有的边界，将人类学问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教授）

论衡

21世纪资本范畴的哲学思考

雷芳

“哲学是用范畴来追问一个时代。今天，我们用资本范畴来追问21世纪的人类生存境遇和时代精神。”日前，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经济哲学研究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1世纪资本范畴的哲学思考”——暨首届全国经济哲学30人圆桌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国内二十余所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们齐聚一堂，探讨资本范畴在21世纪新的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当代延续。

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历史悠久，从古希腊哲人的经典论著，到近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撰写，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深刻而又智慧地昭示了哲学与经济学内在勾连的历史事实及魅力。

理解资本范畴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张雄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通常把资本范畴诠释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预付金”，哲学家黑格尔赋予“资本永恒”的符咒。但随着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使人类对资本的认知从幻象走向真理。马克思资本范畴内涵有四个方面：作为预付金的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作为权力象征的资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郝立新认为，要注重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研究的方法论，这包含三个维度：首先，要坚持马克思历史、辩证、矛盾的分析方法与社会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相统一的原则来研究资本。资本既是经济范畴、社会范畴，也是历史范畴；其次，马克思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高度融合，资本是生产要素，更是社会关系；再次，马克思将科学分析和道德批判有机结合来分析资本，把握资本的二重属性，即普遍性与特殊性。

上海财经大学范宝舟教授则认为，要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把握资本范畴，既不能把资本妖魔化，也不能把资本神圣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依次经历了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这三个历史阶段。从形态上看，既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也有当今多元化、虚拟化、复杂化的资本形态，每一种资本的运行规律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出现，激活了国内外学界对资本范畴的重新思考，如法国学者皮凯蒂、美国学者哈维以及意大利学者奈格里。会上，如何评价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也成为学者们的讨论焦点。

说到皮凯蒂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认为，他运用西方经济学实证主义方式、统计学和西方经济学概念，得到了与马克思《资本论》结论相一致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缺陷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但其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实证主义的数据分析仅囿于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将第三世界的两极分化排除在外，无法得到对资本本质的认识。

针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和贫富悬殊问题，皮凯蒂提出全球财富累进税的干预方案，而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健教授指出，这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在风险投资回报、脑力劳动投入、创新性劳动、市场贡献等因素参与分配过程中，按劳分配在衡量和测定上的困难使得通过按劳分配达到公平正义成为一个理论抽象。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卜祥记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资本也应是一个包含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私人资本的整体性存在。安徽财经大学王程副教授认为，在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资本以一种整体主义范式、“人民财富动力论”方式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壮大的历史工具。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邱卫东也指出，“以人民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的物质力量，追求经济正义进而实现民富国强，是社会主义资本与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区别。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紧随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而不断变换追问方式和追问方向，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是与会学者的一致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研究员提议，国内经济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注重“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建构。张雄认为，从经济哲学研究深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深层领域，这是国内经济哲学研究学者走向理论自觉的又一高度。经济哲学研究工作者虽然有必要关注经济理论与哲学理论的相互勾连问题域，但是追求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的当下经济哲学思想与理论的建构更为必要、更加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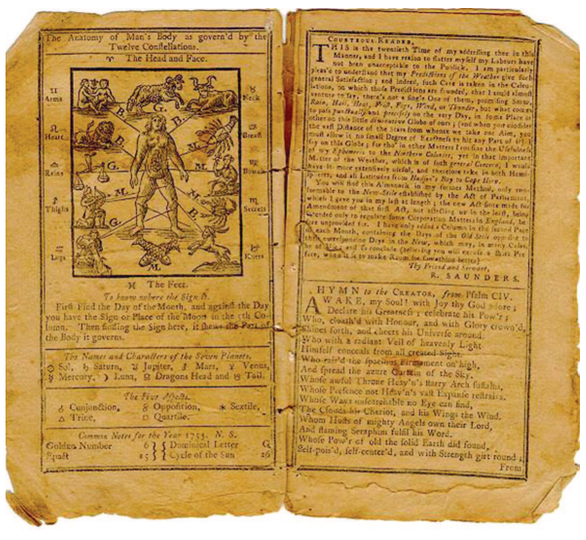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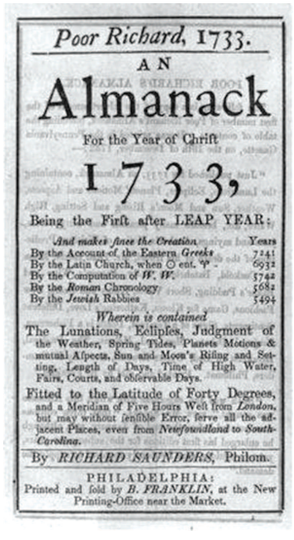
视界观

《穷理查历书》的时代刻度

谭牧

当下出版市场不缺年历、历书，年年人手一册，装潢精致可人，小则励志，大则契合个人兴趣。世界共享时间刻度保证万代一时，却全不妨碍以“历书”出版规划“小世界”的生活秩序。回顾18世纪“年轻时代”的美国，种种“历书”如我国农历，唤起早期北美大陆对地区生活秩序的理念。这些历书虽然不至于造就社会学家所称的“共同体”，却至少规制了早期北美居民生活秩序。





▶《穷理查历书》内页与1733年版扉页

各类历书中，18世纪中期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托名“理查·桑德斯”出版的《穷理查历书》颇受费城居民欢迎。历书第一页申明，此书是为宣扬良好有序生活的天体节律及日用常识。其内容编排颇知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天体运行、农时潮汐时序井然，菜谱与诙谐箴言、致富忠告穿插其中，日常用度方面也多可鉴考，满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整套历书每页密密麻麻，夹杂星座符号、圣徒纪念日、有宗教寓意的木刻版画、解剖知识等有趣大杂烩，可以看出，富兰克林推崇的启蒙寓教于乐的观念，浸润全书。《穷理查历书》的整体设计全然不及当今四色印刷赏心悦目，但拙朴笃实，颇合平民口味。18世纪，北美人的生活以农耕、徒工与贸易为主，未受资本主义升级的影响而至人人焦灼，于是《穷理查历书》也影响了遗留的审美趣味。所以，到了19、20世纪，此类历书的封面与扉页也都以描述农耕生活的木刻版画为饰，宁舍华丽装潢。美国人素不喜华章巨著，但砖头厚的历书之类始终销量不减。

18世纪实为出版历书的卖方市场，《穷理查历书》成为弗吉尼亚地区人手一册、家家具备的普及读物，富兰克林的印刷生意初战告捷。其实各款历书为北美居民两百年以来刚需，有诙谐者如《板球历书》，也有宗教色彩浓厚者如《亚伯拉罕历书》，到19世纪出版市场竞争日渐激烈，《穷理查历书》不及套色印刷的其他历书，而逐渐势弱。

有一套历法和有一套生活戒律的德性是两回事，此时的北美大陆人人都乐得设想锱铢成富，也乐意“扩张产业以荣耀上帝”。历书所赞颂的生活戒律对应德性，是个人化的衍生之物，幸而勤俭节欲也符合清教精神的实用主义德性。然而，也不宜高估历书的作用——日日翻检而仍对德性积累所成不屑一顾，完全不是新鲜事。

转向现代，仍有人力图计量每日做成几桩事，践行一种成功学。但现代人所愁不在不勤奋，而在烦劳太多，每一德性都急于兑现增益歧出的生活之路。缺乏对中枢德性的谨慎考量，生活反成抵押自身：“瞎忙”与“急躁”如影随形。21世纪现代人的阅读口味最喜明显直白，最忌与读者斗心眼、说谜语。自命“穷理查”可是丢掉出版市场的疯话，市场疯抢的都是“富理查心经芒格版”“富爸爸心得”，标题若苦口婆心劝解谦冲自律乃至德性积累，恐怕无人问津。所以，要看富兰克林未竟之言，还要看《富兰克林自传》所述的生平故事。

富兰克林有一处和当今人同，即早知“人设”之用意，少不了对自己也用上春秋笔法。他早年凭印刷铺生意起家，多有坎坷，看尽家业兴衰，兄弟冷暖；中年被派往言论蜂起的法国做大使，他并无政治家亚当斯天生贵族气度，也无杰斐逊气宇轩昂，更无潘恩以斗士风采雄辩诸国，这位“美国人”在欧洲宫廷算不得打眼，但他擅长周旋之技艺，多次使欧美间龃龉转危为机，然而在《自传》中，他一字不提。富兰克林秉持其一贯的实用主义。作为严谨苛刻之人，他在《自传》中推荐清苦青年时期所制“德性历表”，历表结构纵横朗然，每事于德性校验皆记，却承认并未长期坚持到底。他还将中年政敌的喧嚣攻击，化解为对自己众多政绩心平气和的总结：我做的是实事，就是修路而已，有一次我亲自履践通向市场的镇上小路，发现排水不佳，泥泞满地，遂叫人来清理，倒是为当地做了好事，心甚快慰。对自己为后人所留遗产，他自命：其实我所留下的无非美德践行而已。

当下时世，是美国由“年轻时代”转换为“初老时代”。1773年间的北美，大选尚不是全国政治生意，联邦推动的阶层洗牌还未全面开启，北美大陆还算文化传播的蓝海。20世纪以来代议制民主已趋金权政治，民情风向已好辩虚浮；出版业以擅卫闻虚言为计，纵情娱乐反为叛逆之德。当下美国电影《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声称，由于阶层固化，富兰克林式人物在当代已经不可能再上行；小说家、社会评论家汤姆·菲茨杰拉德托名写《穷理查哀歌：应时故事》（*Poor Richard’s Lament: A Most Timely Tale*，2011）诘问当今美国社会是否为富所累。一国如年轻人，难解“举业不为自律勤俭所成反为所累”何以风气难遏之时，也是以平等自由自命之国“初老”年代将近之时。

18世纪盛行的《穷理查历书》一卷规划所及不过周年，邦国民情所及不过十载，“年轻时代的美国”若比拟为人，则亟需依托“年轻之国的老人德性”和“一番青年激进德性”相成辅佐。但盛衰浮沉，以穷困之德济盛世危言，难不依托“年轻之国的老人德性”。然而今人眼中富兰克林只寄名商业巨头，化为符号，搜遍全网鲜见《穷理查历书》原本，却铺天盖地见商业替代品——巴菲特五十年智慧合伙人之《穷理查宝典》，将枢德教益和世俗智慧埋没殆尽。正应史家多叹：古人直书今人意，今人难解古人心。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